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主编 苏长和

In The Shadow Of Hegemony: Strategic Choices

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

韦宗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主 编 苏长和

In The Shadow Of Hegemony: Strategic Choices

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

韦宗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韦宗友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苏长和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8977 - 8

I. 霸... II. 韦...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592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

苏长和 主编

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

韦宗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04,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8977 - 8/D · 1653

定价 25.00 元

总 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更早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研究院成立以来,得到兄弟院校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和学术前辈的鼓励和支持。我院具有较悠久的国别、区域和外交史研究传统,研究人员的语言优势极为明显(国际关系学科点研究人员掌握的语言总共有9种),研究院这几年除了开拓新兴研究领域(国际组织研究、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以外,对传统的国别、地区和外交史研究依旧格外珍惜,丝毫不作偏废,并且鼓励研究人员借鉴多学科、多方法途径,争取在这些传统研究领域上做到有所发展和超越。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就是整合研究院学者这些年在已有传统领域的个人研究成果,试图反映全球化时代战略、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新变化所做的一个尝试。

丛书缘起于我院韦宗友副教授2006年开始主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外交类型研究”(项目编号:KX161004),他对丛书的出版,功不可没。项目最初规划的时候,主题涉及经济制裁外交、强制外交、先发制人外交、准联盟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援助外交等。该项目现在已陆续结项,我们择其研究精华,纳入本丛书。当然,丛书并不限于战略和外交部分,我们觉得,当代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用于国际关系进程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地方政治与全球政治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各种议题之间相互交织的程度越来越深,文明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迫切,各大区域的一体化走势越来越明显,各种国际政治思潮的竞争越来越复杂,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国际关系学者的思存视野,需要我们给予学理关注。我们学力不逮,因此,丛书不可能包罗所有这些问题研究,但是,就其中某些问题做出我们的思考,还是可能的。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丛书定名为“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自以为,“增信去兵”是外交的最主要目的,而如何将对手变成朋友而不是消

灭对手,则是战略的最高境界。这两点是中国古今战略文化和外交文化的精髓。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存。国际社会通过人文沟通和外交互动,能够更多地“足信”,而不是将精力放在“足兵”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发展,这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应有之义。学者们方法不一,观点各异,但所谓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此“公”于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秉“公”研究意味着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尽心尽力,为国家和人类治理增信释疑、趋善避恶,贡献出自己的思考。我想,这也是我们丛书作者共同持有的一个研究理念吧。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曙光副校长自始至终关心“当代外交类型研究”项目和本丛书的进展工作,当初项目规划时,他就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和校国际关系博士点负责人胡礼忠教授,一直给予我们新生的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以关心、照顾和支持。三位前辈为上外国国际关系学科做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我代表研究院对他们表示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荔红女士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其专业、敬业、乐业的精神让人敬佩,她是这套丛书最合适不过的编辑了。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学界朋友给予这套丛书以批评、建议,更好地帮助我们编好这套丛书。

苏长和

2009年11月5日于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前 言

自有国家体系(state system)以来,霸权威胁一直是国家间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无论是古代中国的诸侯国之间,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之间,还是1648年以后的欧洲国际政治舞台,抑或是当代的世界,霸权阴影总是如影随形。毕竟,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是如同万有引力一样不可改变的铁律。有发展的不平衡就会有权力的变迁与差异。而这种权力的变迁与差异又因国家生活的外部环境特征而产生相当程度的危险性。与有法律和权威约束的国内政治不同,国家置身其间的环境是一个“利维坦”(Leviathan)缺失和国际法软弱无力或付诸阙如的无政府领域。这一无政府状态又因资源的稀缺、利益的冲突以及国家间普遍具有的一些进攻性军事力量而大大恶化,国家间的竞争具有相当程度的“零和”特征:“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①权力的变动不拘与外在环境的险恶,导致国家对权力更大的欲求:权力不足者孜孜以求,而重权在握者谋求更大的权力。当某一国的权力急剧膨胀并开始谋求体系范围的支配地位时,霸权威胁也就由此产生了。

当霸权威胁形成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将采取何种对外政策行为来应对威胁、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呢?国家行为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国家在进行这些抉择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政策选择对一国的生存与福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利弊得失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说,霸权威胁以及如何应对威胁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霸权冲突的历史。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理论也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国家在面对霸权

^①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

威胁时的行为反应以及行为的根源,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均势理论可能存在的不足甚至谬误。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研究霸权威胁下的行为反应,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参照或教训。虽然无论是历史还是理论,都无法为人类的未来行为提供完全的指南或“秘诀”,但好的理论以及“历史遗训”无疑有助于人们少犯重大的错误,甚至可以“避免悲剧重演”。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今的世界又一次迈进历史的“关口”:一个新的霸权威胁正在世界政治的地平线上渐渐升起。美国权力在后冷战时代的急剧膨胀、美国日益凸现的单边主义以及对他国主权的漠视,都昭然若揭地显示了美利坚新霸权的存在和威胁。对霸权威胁下之国家行为反应的历史和理论审视,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可以预知国家对美国霸权可能具有的反应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可以为如何有效抗衡美国的霸权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

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观点。一种是均势理论作者所持的“制衡论”。他们认为,国家在遇到他国权力的急剧增长及霸权图谋时,将会奉行均势政策,挫败该国的霸权企图,恢复体系的均势。不管是从“人性”角度论述制衡权力之必要的传统均势理论作家,还是从“结构”视角论述制衡权力及均势形成之必然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基本上都持这一观点,尽管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存在重大区别。如爱德华·古力克(Edward Vose Gulick)指出,在一个每个国家只能管理本国的国家体系中,防止任何一国的霸权企图是一种广泛的、每个政治家合乎逻辑的行为反应。^①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son)也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结构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②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则指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况这一外在结构对生活其间的行为体的行为起到了巨大的“选择”作用,使得行为体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面临某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以及由此引

①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 W. W. Norton & Company, 1967, pp. 297—299.

②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64页。

发的霸权企图时,将单独或联合他国进行制衡(balancing),恢复被破坏的权力平衡。由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体系引发的是相互制衡行为,而不是追随行为(bandwagoning)。因而,人们不会看到一个世界霸主的问世,而是均势的反复出现。^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遇到体系范围内的霸权威胁时,国家并不总是奉行制衡政策,相反,追随是一种常见得多的行为反应。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是这一观点的最主要代表。他指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是由它们所认定的利益决定的,而不仅仅取决于权力的分布。“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②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定是截然不同的,它们的对外政策行为也大相径庭。对于现状国家来说,由于现存秩序反映了它们的利益和偏好,它们是现状的受益者,因而致力于现状的维护。一旦出现危及现状的霸权威胁,将采取制衡行为,挫败霸权觊觎者的霸权企图,重新恢复体系的均势。但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它们是现存秩序的“局外人”或“受害者”。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所言:“秩序越来越像一件紧身衣,它们裹在其间或者碌碌无为、甘心衰败,或者彻底摆脱束缚。”^③它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秩序中得到满足或实现,因而将乐于追随那些旨在推翻现存秩序的大国或联盟,彻底摆脱束缚。此外,由于制衡的成本相对高昂,大多数国家都尽量避免奉行这一政策,即使是现状国家也不例外。因而,追随行为要比制衡常见,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这两种基本对立、各执一端的理论观点,虽各有合理性的一面,却存在视角上的“偏见”或理论上的“盲点”。“制衡论”强调的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和无政府结构的压力,认为在一个中央权威缺失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听任任何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及霸权企图,将陷本国的生存及安全于危险之中,因而必须制衡他国权力的激增及由此引发的霸权威胁。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为什么每当体系出现霸权威胁时,仍然有那么多的国家不愿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23—128.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nclusion.

③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页。

制衡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选择了不介入(noninvolvement)的立场,甚至还会追随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呢？到底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国家的制衡动机和行为呢？“制衡论”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论关注,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追随论”而言,施韦勒虽正确地指出被沃尔兹等“制衡论”者所忽视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行为倾向,使人们对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下的行为反应有更全面的认识,也部分了解了制约一国制衡行为的限定因素,但问题是,仅从国家的“属性”上来判断一国的行为,即使并非如沃尔兹所言是犯了“简化主义方法”(reductionist approach)的错误,至少也是片面的或不全面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国家奉行某种对外政策可能与该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或现状国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体系压力与自身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在上述理论争论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史实,提出了第三种理论观点,特别是明确提出了“不介入”的概念;此外,我们在部分承认沃尔兹观点合理性的同时,着重探究到底哪些因素制约了国家的行为选择,使得具体的国家行为选择与沃尔兹的“制衡论”发生了巨大的偏差。

我们认为,在面临霸权威胁时,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并非只有在制衡或追随这两种基本对立的行为中进行取舍,而是面临着三种战略选择:制衡、追随或者是不介入。不介入是介于制衡和追随之间的一类政策行为。中立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不介入又不同于中立。不介入涵盖的内容要比中立宽泛得多(本文的第二章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一国奉行不介入,既可能是出于避免风险或引火烧身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隔岸观火、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乘机牟利的考虑。正由于不介入政策“退可自保、进可谋利”,因而在霸权冲突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国际政治行为。追随也有着类似的效果。一方面它通过“与强者为伍”而避免了霸权国的敌视或打击,缓解当下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它还能够 在霸权国允许的范围内获取额外的利益。相对于前两种行为来说,制衡则是一种成本高昂的行为反应,需要国家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制衡的成功与否往往还取决于制衡方的合作程度。换言之,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若非迫不得已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尽量避免采取制衡政策。因而,在面临霸权威胁时,从体系范围来看,追随以及不介入是常见得多的对外政策行为。

然而,不介入或追随行为虽然可以缓解当下的生存压力甚或可以获取些许利益,但无论对于体系的稳定还是对于单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及安全来说,都是不利的。正如中国战国后期的国家行为表明,追随霸权或在霸权冲突中持不介入

立场,最终的结果是,从体系层次来看,体系由原先的无政府状态一变而成为等级制体系,秦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权威;从单位层次来看,秦国将体系范围内的其他单元悉数灭亡,各国并没有因为追随或不介入眼前利益而能够幸免于难。我们在此并非要进行价值判断。实际上,进行价值判断往往是十分容易的。它只需在抽象的环境下,选出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无需考虑具体的限定因素,也不要深究为什么具体的行为并没有按照理论预期发生。而我们要探究的正是为什么国家并没有按照价值判断去行事,在“理应如此”(ought to be)与“事实如此”(to be)之间,到底是哪些因素进行了“干扰”?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考虑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外,具体地说,体系的极、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地理位置以及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或观念)对一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具体情境中的国家对外政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沃尔兹所认定的“体系所鼓励的行为”。此外,在无政府结构下,国家间交往中难以逾越的囚徒困境以及在涉及集体行动时所固有的集体行动难题又加剧了制衡的成本,鼓励了“搭便车”和“背叛”行为。所有这一切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从体系范围来看,不介入以及追随成了国家面临霸权威胁时更为常见的行为反应。而不介入和追随行为的“横行”,又常常导致反霸努力的失败或低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政治并没有全然呈现沃尔兹等均势论者所描绘的“均势——不平衡——均势”的图景,而有时也展现出“霸权——均势——霸权”的历史画面。

当然,作者无法宣称上述变量已经囊括了制约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所有因素,也无法说只要输入上述变量,就能得出规律般的国家行为。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可能所有涉及到人的社会科学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说,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可能要大一些。然而这样做,的确要冒极大的风险。一个显见的缺陷就是,本文忽视了国内政治对于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如一些研究者表明,在有些情况下,一国的对外政策或重大的国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国内政治博弈。^①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较为复杂,它涉及官僚政治、党派政治、利益集团甚至领导人

①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国际冲突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约翰·伯顿(John W. Burton)在《全球冲突: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一书中,主要从一国的国内政治来探讨国际冲突的根源,该书也是这一领域内的经典著作之一。参见约翰·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的性格、素养等诸多层面,如果考虑进来,本文将不堪重负,也大大超出作者的能力。因而,在考虑制约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时,我们一律将国内政治因素排除在外。

本文是以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同时假设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统一”在此意味着我们不考虑一国的国内政治,而仅考察国家置身其间的外部环境以及这些外部环境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这样,我们依然遵循了类似于沃尔兹的“由外而内”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们的“由外而内”研究方法 with 沃尔兹的结构主义方法又有很大的不同。沃尔兹仅从无政府结构以及体系的权力分布来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的结果,而不对具体的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作出解释。即便沃尔兹也提到了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将会奉行制衡政策,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那也仅是“一种行为趋势”,或一种“理应如此”的价值判断,而非针对具体的行为。本文的“由外而内”研究方法则具体地考察了体系的极、地理位置、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决策者的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甚至国家间互动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共处中的囚徒困境问题也被考虑进来。换言之,我们不仅考虑了国家间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也考察了国家间的互动对一国行为的影响,甚至考察了这些外部限制对决策者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决策差异,即我们对国家行为的限定因素的考察是具体的。同时,我们将观念因素引入进来,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具体的国家行为本来具有的“能动”特征,即决策者并非只是消极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压力,而是根据自身对环境的判断能动地作出反应。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面临相同的外部威胁,不同的国家会作出大相径庭的行为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理性与微观经济学以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指的理性也有所不同。微观经济学认为,市场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经济人”。^①这样的“经济人”被设想为“全知全能”的具有“完全理性”的人,其行为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他能够在既有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经济人”的这种“理性选择”既体现在消费领域,又表现在生产领域。从消费领域来说,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找到一个可获得最大效用的消费方案;从生产领域来说,就是在给定的技术和资源下找到一个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

^①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杨砾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代序,第7页。

优生产方案。^①“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眼前的一切深思熟虑。他在决策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效用函数”或“优先选择的次序”。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导致的后果,或者起码能给未来可能状态提供一个概率分布。他按照自己的选择偏好,对各种可能的后果进行排序,然后选择排在序列首位的“效用最大化”的措施。^②

微观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这一“理性选择”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一切需要对稀缺性资源进行合理使用以达到某种既定目标的人类活动领域。^③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里得到了某种呼应。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摩根索指出,虽然人性是多元的,现实的人可能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等的综合,但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行为体(指国家)的“人性”却具有鲜明的“政治人”的特征:他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根据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的原则来思考和行动。这也是政治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④“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其直接目的”。在自由、安全、繁荣、权力等目标序列中,权力总是居于显著的位置。权力不仅仅因为其本身的重要性——权力可以将一国推到权力斗争的前沿,也可以使一国丧失积极参与这种斗争的能力——而值得谋取,也因为它是国家赖以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十字军想使圣地摆脱异教徒的统治;伍德罗·威尔逊想使世界安享民主;纳粹想使东欧成为德国的殖民地,想统治欧洲并征服世界”,都是以权力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⑤而各国对权力的不懈追求(特别是以谋取他国领土为特征的征服战争),使得权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一方权力的增长可能就意味着另一方或他方权力的相对甚至绝对的缩减。为避免出现这一局面,为在“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中不被“淘汰出局”,理性的行为体将时时对他方的权力增长保持警觉,“权力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⑥摩根索认为,这种对权力的普遍争夺

① 张良桥、冯从文:《理性与有限理性:论经典博弈理论与进化博弈理论之关系》,《世界经济》,2001年第8期。

② 刘凤英、许锐:《有限理性的奠基人:西蒙评传》,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③ 陶大镛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④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15—19页。

⑤ 同上书,第36页。

⑥ 同上书,第45页。

以及以权力对抗权力的最终结果是,没有任何一国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权力分布将呈现大致平衡的均势结构。^①

我们看到,摩根索从理性的“政治人”的假设中,推导出的是一幅权力冲突频仍,并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大体维持了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大致平衡,即均势的画面。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沃尔兹在其理论建构中,也使用了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假定。不过,与摩根索将国家设定为“权力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不同,沃尔兹笔下的国家是个“安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沃尔兹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首要的任务并非寻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安全的最大化,因为权力过大或不足都不利于国家的安全。在无政府结构下,各国对安全的寻求,也会产生“安全困境”,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②即安全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此时,一国权力的急剧增长及霸权图谋必然引起他国的制衡,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际政治中均势的一再出现。显然,无论是国际政治的结果——均势,还是无政府结构压力下的国家行为——制衡,都是“安全最大化”的行为体“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种理性假定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等人的批判。西蒙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假定不仅与客观实际大相径庭,而且这种完全理性的假定也无法对很多经济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完全理性”的假定固然可以达到如神一般的状态,却与现实人类的实际或可能的行为不发生任何关联。^③因为,实际的决策者不仅受到自身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而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而且也受到决策者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其他决策者的影响而不可能做到“最佳决策”。他对自己行动条件的了解,从来都是零碎的,不完备的。^④“现实中的人并不是也不可能严格按照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要求作出决策,在多数情况下参与人通过了解博弈的历史及模仿其他参与人的行为而进行决策”。^⑤也就是说,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

①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222页。

②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3—4页。

③ 刘凤英、许锐:《有限理性的奠基人:西蒙评传》,第43页。

④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杨砾等译,第79页。

⑤ Herbert A. Simon, "Invariants of Human Behavior," *Annual Review Psychology*, 41, 1990, pp. 1—19.

寻求的是“适度的”或“满意的”效用,而非“效用的最大化”。

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制度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后者指出,个人、尤其是政府,与其说是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完全理性行为体,毋宁说是个计算能力受到限制,并深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之苦的有限理性行为体。^①正因为决策者只是具备“有限理性”的行为体,国际制度因其可以提供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减少计算成本等优点而可能在“霸权之后”继续发挥作用。基欧汉据此提出,在建构世界政治体系的理论时,可以不必依赖于不现实的、蕴含于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定。^②

与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假设一样,本文所假定的理性也是有限理性。我们认为,国家在进行决策时,并非遵循完全理性去寻求“利益最大化”或“最佳的”结果,而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寻求“适度的利益”和“满意的”结果。行为体不仅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也受到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历史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它们充其量只具备“有限理性”。虽然从无政府结构的逻辑出发,制衡任何一国的霸权企图既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体系的稳定,但具体情境中的国家却作出了与结构要求大相径庭的选择。它们的行为多半是“应急式的”或“刺激反应式的”,而远非深谋远虑的产物。在当下压力与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多半会“照顾”眼前,尽管这可能会危及其长远利益。因而,身处无政府结构下的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可能不会如沃尔兹所言去进行制衡,而是见机行事,或不介入或追随。

就本文的结构而言,我们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在理论研究部分,我们先对现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中寻找对本文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以及发现现有理论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虽然理论建构需要“创造性的劳动”,但却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前人的思维成果而“闭门造车”。了解前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让我们跟踪该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掌握最新的理论动向,还可以极大地启迪我们的思想,捕捉理论创新的灵感。即是“温故而知新”吧。

在对现有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虽然我

①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9页。

② 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们的理论是在“批判性地吸收”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建构遵循的是一条“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或纯粹的演绎方法。实际上,本文理论的灵感恰恰源自对学者们的理论与国际关系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史实所出现的重大不一致的反思,而写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对这些史实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在建构理论时,力图做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或者说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实证部分,我们选取了两个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案例,对本文的理论观点进行验证和说明。在对这两个历史案例进行研究时,我们主要采取了历史研究法,即主要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进行“历史的再现”。我们希望通过“让历史说话”的方法,来自然展现和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假设,避免理论对历史的“强词夺理”。

除了序言和结论外,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在第一章里,集中对国际政治理论界关于制衡与追随这两种理论争论进行介绍,并进行分析和评价。我们发现,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实际上涉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面临剧烈权力变动或霸权威胁时,体系中的国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为详细了解这一场争论以及各自的理论观点,本章对争论各方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这也为我们发现这场争论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了便利。

第二章是第一章理论争论的逻辑延伸,也是本文理论的核心。本章提出了全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及主要理论命题与假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霸权威胁时的行为反应以及国家行为背后的限定因素。提出的主要观点与假设是,第一,国家面临霸权威胁时,往往有三种行为选择:制衡、追随以及不介入。第二,在体系的极、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地理位置及观念是影响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四大主要变量。此外,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难题及囚徒困境也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反霸合作与效率。因而,在面对霸权威胁时,国家会表现出明显的“有限理性”倾向;尽管制衡可能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体系的权力均衡,但并非如沃尔兹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体系内的主导战略,相反,追随与不介入是更为常见的战略选择。第三,在同一极中,权力相当的国家倾向于制衡对方的称霸企图;实力孱弱的国家在缺乏坚强的外部援助时或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时,会倾向于奉行追随政策。第四,拥有独特地理位置(如四周为水域阻隔的岛国或为高山险峰荫庇的盆地式国家)或远离祸端的国家,无论是大国或小国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奉行不介入政策。第五,当霸权觊觎者被认为是一个

“仁慈的”国家,则国家制衡的动机可能会大大减弱,追随及不介入将极为常见;当霸权觊觎者被认为是个“邪恶的”国家,则制衡的动机大大增强。

第三、四章是对第二章理论命题的历史检验。第三章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历史案例,选取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计180余年的时间。选取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周王室的衰微,此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既无“天下共主”的权威,更无“号令天下”的实力。王室衰微,诸侯争雄,原先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制秩序已不复存在,权威和权力格局都呈现出水平分布的情景。换言之,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诸侯国已成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独立的政治单元。另一方面,此时的诸侯争霸风起云涌,联盟聚散离合,竞争血腥残酷,是研究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下行为反应的绝佳素材。而且,这一时期前后长达180余年,可以较为有效地纠正一般个案研究中所面临的“特殊有余而普遍性不足”、理论价值不足的局限性。^①通过这一历史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家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制衡并不是最为常见的行为反应,更不是唯一的行为反应。由于国家在权力、地理位置以及对威胁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囚徒困境以及集体行动难题,大大制约了制衡行为的发生和制衡的效率,众多国家选择了不介入和追随战略,致使六国为后起之国秦国所灭,六国抗秦归于失败。第四章则以拿破仑称霸战争为例,进一步对第二章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各国更关心的是眼前的一己私利,在眼下安全压力与体系安全及国家的长远利益发生张力时,作为有限理性的国家都是以损人利己或短视的方式进行自救。正因为如此,各国对拿破仑霸权威胁的反应并非只有制衡,而是制衡、追随以及不介入三种行为反应都迭次呈现,且后两种行为反应要远远多于第一种。

第五章是对前面四章的理论与历史的反思。理论与历史都证明,在面临霸权威胁时,具体情境中的国家很难作出“全然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反应。它们充其量只是具备有限理性的行为体,往往无法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完全理性的决策。囿于自身能力或外部环境,它们常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整体利益,寻求的是“过得去的”或“满意的”结果,而非“利益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在面对霸权威胁时,制衡并非主导战略选

^①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个案研究法的优点与不足,请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择,追随与不介入要更为常见。由此我们也看到,国际政治的图景并非全然如沃尔兹等均势论者所描绘的“均势——不平衡——均势”图景,也呈现出霸权稳定论者所描绘的“霸权——均势——霸权”画面。

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也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美国“独霸”及反霸的缺失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为如何在新形势下反霸提出了一些思路。